

# 作为方法的广州

## ——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罗成\*\*

〔摘要〕

近年受到热议的“逃离北上广”现象背后，隐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性的重要问题。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道路，依次历经了“毛式城市现代性”和“经典城市现代性”的两个阶段。前者诉诸尊严政治，后者吁求明日田园，但共同趋于浪漫化和理想化，城市化乌托邦得以实现的背后却是更多复杂现实的遮蔽。以城与村的纠葛为城市异象表征的广州，凭村际群落的地方性经验，展现了一种生态城市现代性的本土实践。进而，广州作为方法还向中国城市化现代性提出了更值思考的问题：现代性实践如何能够重塑流动个体与现代大都市之间的归属认同。

关键词：广州、现代性、城中村、村际群落、生态城市、身份认同

---

\*本文属于教育部2010年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公民社会想象”（10YJCZH103）研究成果。本文的删节版曾发表于《文化研究》第14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 一、“北上广”的位置图绘：现代中心与本土边缘

近年来，伴随高房价、蚁居族等现象，“逃离北上广”这个颇具噱头色彩的口号应运而生。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员百姓，都在纷纷热议。2010 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 3 卷本的“逃离北上广”图书系列，分别为《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州太竞争》。尽管有着炒作之嫌，但从刺眼的标题上，还是可以捕捉到这个华丽时代背后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焦虑、困惑与纠结。

所谓“逃离北上广”，是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中的年轻人，由于房价居高不下和生活压力益增，试图以退出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的方式，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但是，仅仅过了一年，“逃回北上广”这个更富戏剧性意味的口号又被大众媒体铺天盖地抛在了社会面前。<sup>1</sup>从逃离到逃回，归去来兮之间，夹杂着无名大众的希望与失望、退避与不舍、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其实，在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北上广”作为大都市典型代表所蕴含的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在高房价、强压力的表象下面，无论是逃离还是逃回，这里所隐涉的其实是一个稍不留神就会轻易忽略的关键问题：人与城市的关系。按照著名文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但我们再仔细辨认一下，我们所生存的城市，究竟是一个温暖如归的“家园”，还是一所望之憎恶的“牢笼”，可能就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也许，那些归去来兮的人们，正是在追求“家园”理想与忍受“牢笼”现实之间试图去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但无论怎样，这些城市之于这些放弃者或追求者而言，意味着更多的一些东西。无疑，就社会大众的想象和期待而言，“北上广”是一个包含了无穷意味的符号，一种当代中国大都市及其所象征着的生活方式的表征。“北上广”这一称谓所指涉的意涵其实远远超过了日常层面的房价、压力和前途，那隐匿其中的核心焦虑其实是全民族百余年来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那个被称之为“现代性”的梦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上海、广州同为中国社会寄托现代性梦想的“容器”，它们却又各自拥有交织了传统与现实的某种微妙差异。从文化心理来看，

---

<sup>1</sup> 于德清：《年轻人为什么又逃回“北上广”》，《新京报》2011 年 7 月 17 日；北岸：《年轻人何“逃回北上广”？》，《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27 日；贺兰：《逃回北上广：无处安放青春》，《南方都市报》2011 年 10 月 28 日。

北京是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则是近代以来迅猛兴起的经济中心。至于广州，虽然一直是中国进行海内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甚至唯一口岸，但很少自认为是什么“中心”。相对于北京、上海那种“双城记”的抗衡与较劲，广州的确一直颇显边缘。从地理位置来看，由北京、上海到广州，的确可以由点带线，勾勒出一条中国东部一线城市的黄金连线。但就历史地位而言，广州的城市影响力却在近二十年来落在了京沪两地的后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借助改革前沿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广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度以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全国，形成了短暂的“三足鼎立”<sup>2</sup>局面。但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上层建筑力量的强势介入，伴随上海浦东的开发，广州再一次被上海赶超。同时要注意，其实“广州”往往总是被隐匿在了“广东”的背后，哪怕是所谓“三足鼎立”其实也只是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广东与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的抗衡。

因此，本文想尝试做的是，回到作为一座城市的广州，去探寻它在中心城市之外所可能包蕴的别种经验及思考空间。显然，在“北上广”的同质化能指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异质化现实的差异。北京、上海代表了中国大都市的“现代中心”型实践取向，而广州则意味着一种别样的“本土边缘”型实践经验。

## 二、毛式城市现代性：尊严政治及其悖论

毋庸置疑，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剧烈变化，最重要的表征便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想和抱负寄托在了 GDP 高速增长的衡量标杆上，举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则更是这一梦想实现的核心载体。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sup>3</sup>按城乡人口比重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比率 1949 年为 10.64%，1976 年为 17.44%，1978 年为 17.92%，2011 年为 51.3%。显然，1949 至 1976 年的中国城市化比率仅增长了不到 7%。1978 至 2011 年的 33 年间，城市化比率却增加了 33.98%，并于 2011 年历史性地突破了 50% 的界线，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期。预计到 2020 年，将会达到 55%，到 2030 年可能会达到

<sup>2</sup> 杨东平：《城市季风》，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5-371 页。

<sup>3</sup>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1》，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 2 月 12 日发布，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65%。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曾经探索过的道路。

如果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间节点，1949 至 1978 年的中国城市化建设，我们不妨称之为“毛式城市现代性”探索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城市建设道路，学界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三：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了城市化进程，将建设重点放在了农村，大力促进农业发展，将大量人口留在了农村，实施的是“反城市化”（anti-urban）的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采取的是“城市偏向”的策略，即政府依靠户籍管理制度和配给政策隔离城乡领域，并利用农业剩余价值作为城市工业的资本来源，同时在城市的建设中有力约束和削减消费性、服务性行业的投资，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是在吸收马恩列斯几位经典作家对待城市化态度的基础上，尤其是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政策。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其一，布局上，改变 1949 年以前空间分布的不合理状况，即现代工业过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调整工业城市的平衡分布以及合理地靠近原料产地的内陆地区；其二，功能上，将原有的消费型城市改造成为生产型城市，城市的主要职能是工业化生产中心；其三，目标上，城市发展的目的是要促进“三大差别”的消灭；其四，政治上，城市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心。<sup>4</sup>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对于中国社会在 1949 至 1978 年间的城市化建设经验具有更贴切的阐释效果。前两种观点，或将视野完全胶着在了政府对城市化的限制上面，或将理解完全倾向于政府对城市化的偏向上面，都有失偏狭。第三种观点兼顾了新中国创建之初城市化建设的理论来源和现实经验，其核心意义仍然是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在百年战乱之后对于现代性的不懈追求。历史地来看，这一现代性的追求，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现代城市的刺激消费型建设，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式的工业生产型建设，而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即“同步发展”。<sup>5</sup>1840 年以来的民族衰微和国家受辱的历史决定

<sup>4</sup> 此处三种观点来源，参考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香港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71-272 页。

<sup>5</sup> 美国学者迈斯纳指出，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通过剥削农民实现的，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尽可能迅速地制造一个巨大的重工业基础这一压倒性目标。而中国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随即便启动了“新的毛泽东主义经济战略”，

了新中国伊始的城市建设不可能是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注定承载了一个民族对于现代强国的理想。在此，均衡布局、生产中心、平等目的、精神凝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四大原则，也是我们称之为“毛式城市现代性”建设的要义所在。

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建设，首要的是它的政治意义，即展现和维护一个新生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尊严，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尊严政治而展开的。由此，尽管北京城的城墙被拆除了，至今令许多学者抱憾，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遗忘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旧貌换新颜的社会主义整顿改造时期。其中，至今令人记忆最深的代表性事件就是1950年北京“龙须沟”的改造。文学家老舍曾用“五福临门”这一颇具民间风味的表述传递了老百姓对城市改造的欢迎与支持：“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院后要填平老明沟，一福。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我们有了自来水，三福。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赶明几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活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sup>6</sup>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城市改造，既达到了平沟、修路、通水这些现实生活条件改善的目的，同时，更是有活作、有饭吃、有地方散逛这些人本价值得以实现的保障。无疑，“毛式城市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生活方式的追求。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完美理想主义追求的背后还隐藏了诸多更为复杂的都市现实。不妨再来看看1960年代上海棚户区“蕃瓜弄”的改造。据《闸北区志》记载，“蕃瓜弄”是旧上海棚户区居住的一个缩影，它地处闸北区，占地6公顷，居民近2000户，绝大部分居住在用毛竹、芦席、油毡、铁皮之类搭成的简屋棚户内，俗称“滚地龙”，居住环境极端恶劣。1963至1965年，上海市开始进行棚户区的拆迁改建，蕃瓜弄共动迁居民1965户，拆除旧棚简屋2.6万平方米，并建成了上海市内第一个5层楼的居民新村，蕃瓜弄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由3平方米增至7.7平方米，堪称当时旧城改造的典范。但据学者研究发现，“在一部分人敲锣

---

即“促进轻工业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廉价的商品，这会极大地提高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的增加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的根本前提。”这就是所谓的“同步发展”，其代表文献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参【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281页。

<sup>6</sup> 老舍：《茶馆·龙须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打鼓搬进新区的同时，更多不具备市民身份的居民搬进的则是在一两公里外继续存在的条件更为恶劣的棚户区。”<sup>7</sup>这便呈现出了“毛式城市现代性”所隐藏的一个深刻悖论：为了实现工业化进步和平等化理想，中国城市经济实行着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策略，它一方面有效地部分解决了旧有的城市问题，但又由于国家经济总量的贫乏，加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在事实上的差距，导致有限的资源无法真正得到均衡地分配，致使人民就业、居住等问题无法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因此，“毛式城市现代性”主要依靠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减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乃至“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来延缓城市问题的显露。<sup>8</sup>

### 三、列车与立交桥：通往经典城市现代性

一个可供佐证的事实便是，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热潮呈现出了“毛式城市现代性”建设的问题所在。上海作家王安忆笔下的返城知青陈信，正是当时城市问题凸现之时出现的一个文学形象表征。在“文化革命”的年代，作为六七届初中毕业生的阿信，选择了自己入疆而让哥哥留城。文革结束，他费尽力气争取回到了上海，却又面临着就业、结婚、分房等一系列的日常问题，最后回首曾经容身的几个城市，不得不叹息“看来，大有大的难处，小，却也有小的好处。”小说的结尾，作家以富于象征意味的抒情笔调写道：“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远、更大的，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sup>9</sup>有意思的是，同年北京作家刘心武写作了小说《立体交叉桥》，他以城市住房紧张为焦点，展现了新时期伊始城市居民所遭遇到的生存问题。侯锐一家六口拥挤地居住在仅仅十六平方米的房子中，一系列家庭矛盾冲突由此而生。作家借主人公之口深情地呼唤：“快一些吧，拆掉北京城的旧房子盖起新楼，改造街道，修建一系列的立体交叉桥、一系列的街心花园、喷水池……”<sup>10</sup>至此，都市不再仅仅意味着政治运动和人民集会的广场和中

<sup>7</sup> 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文化的包容性》，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sup>8</sup> 【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61页。

<sup>9</sup>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载《上海文学》1981年第10期。

<sup>10</sup> 刘心武：《立体交叉桥》，载《十月》1981年第2期。

心。革命政治的落幕，也是生活政治的开场。如何解决都市人群的生存状况，成为了比以往展示“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广场意识形态更为紧迫的问题。

1981年，京沪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身边的城市及其所带来的人之生存问题，目光的确很敏锐。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供的“列车”和“立交桥”这两种文学意象所蕴涵的深刻意味。“毛式城市现代性”隐埋的悖论，在后文革时代通过现实和想象的途径全面展现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困境：住房紧张，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婚姻交易等等。宏大的政治理想在褪去往日神圣光环的同时，那些普通小人物们始终无法得到妥帖安置的现实困境和内心冲突在文学家的笔下得以集中释放。身负那一时代责任感的文学家们，面对都市问题的重重矛盾，也努力以特有的文学意象试图提供某种想象性解决之道以抚慰都市人群的焦灼内心。“列车”的再次驶出，无疑是现代性时间规划的再次表征，城市问题的解决在此被寄予未来的时间之维。而“交叉桥”的修建营造，则无疑是现代性空间规划的具体映射，城市问题的解决在此被寄予立体的空间之维。无论是时间的前进，还是空间的扩展，两种文学意象共同体现出了国人对于一种经典城市现代性的复归追求。

时光如白驹过隙，“列车”与“立交桥”两种时空想象所表征的现代性，在三十年间已然成为现实。所谓的“经典城市现代性”，在现象层面，指的正是这些数据所显示的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和改造步伐的日益加大和加速。全国各个城市的面积不断增量，大楼、大桥、大广场纷纷平地而起，高层楼盘、豪华别墅、主题公园、高铁机场等各类建筑竞相纷呈，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迅猛发展，中国在一条一往无前的城市化建设道路上阔步而行。在理论层面，则体现为中国当代城市建设对于西方城市现代性思想的吸收和实践。它主要展现为乌托邦城市意象，这是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兴起以来的主流城市意象，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法国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902年，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city）这一著名概念。霍华德认为，19世纪晚期的城市问题十分严重，人口持续向已经过分拥挤的伦敦集中，同时还导致乡村地区活力的进一步衰竭。他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引力”来改善现代城市问题。霍华德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城市和农村好比两块磁铁，各自拥有一定的吸引力。城市磁铁的吸引力在于工资高、就业机会多、前途诱人，但是环境污染、生活成本高是其弊端；乡村磁铁的吸引力则在于景色优美、环境怡人，

但是较之于城市，却缺少工作机会、卫生条件。因此，他提出可以设想第三块“城市——乡村”磁铁，它同时拥有自然美和工作机会，接近田野和公园，有着清新的空气和水源，敞亮的住宅和花园，更有低物价、高工资。<sup>11</sup>其实，霍华德的城市设想的关键在于限制城市持续扩张的容量，他主张当一个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就要停止发展，另外再建新的小城镇，其“田园城市”的梦想便是对小城镇的一种规划设想。

与之相较，柯布西耶则直接针对大城市的治理，提出了“明日城市”的设想。柯布西耶立足于 20 世纪初期巴黎的城市混乱问题现状，提出要以 300 万居民的现代城市为对象，运用几何学的来进行一场标准化的城市设计。柯布西耶认为，改造的基础是拆毁现有的大城市中心而重建，同时消除并远迁贫穷肮脏的郊区。在这一基础上，他的“明日之城”是一个由城市、工业区、花园新城组合起来的新的结合体。这一意象依据功能而进行区域的划分，其中心是城市，由 24 栋摩天大楼组成，主要用于商业活动和旅馆服务，可容纳 40 到 60 万居民，城市中心的地下建有中央车站，摩天大楼的周边建设花园和公园，以及市政府、博物馆、美术馆、大学等公共建筑，摩天大楼占地面积仅为 5%，其余 95% 均为花园绿化面积，同时还有约 60 万人可以住在花园之间的低层住宅社区，其余约 200 万人则住在城市四周遍布森林和草地的保护区外的花园新城之中。<sup>12</sup>由此，这就构成了一个颇为完美的由城市、工业区、花园新城、绿地、高速公路组成的乌托邦城市。

无疑，无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还是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体现的都是现代大都市迅猛发展初期学者们对于城市问题解决的一种积极探索。他们曾深刻地影响到了西方现代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比如伦敦的卫星城的设计，美国大都市的规划等等。并且，它们更是给予了重开国门的中国一个美好的幻象。祛弊兴利，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980 年代文学家笔下的列车和立交桥的梦想，不正可以通过如此这般的城市蓝图得以实现吗？于是，便有了近三十年的中国城市改造运动。神州大地，处处高楼平地起，处处营造花园城市、宜居城市，甚至处处争建“国际化大都市”。无数的道路挖了又填，无数的房屋拆了又建，无数的树木倒下，无数的广场兴起，一片热火朝天的状况，使得三十年

<sup>11</sup> 【英】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7 页。

<sup>12</sup> 【法】勒·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5-166 页。



间的中国俨然有如一片大工地，以致“拆啦”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代名词。<sup>13</sup>但“拆啦”果真带给了我们一个现实而又美好的生存环境吗？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又何必议论“逃离北上广”此类的话题呢？看起来，问题要复杂得多。

#### 四、城中村与村中城：广州的城市异象

表面上来看，相较北京的帝都气象、上海的十里洋场，广州实在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城市。在一轮轮“明日田园”的城市拆建过程中，尽管广州也如北京、上海一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时代的滚滚洪流，但时至今日，北京、上海已然是一幅国际大都市的气度，而广州却依旧残留了某种非城非乡的独特面貌。一方面，广州的现代城市建设，如同全国各大城市一般，也规划了新的城区中心，如1990年代以来的天河区，新世纪以来的CBD珠江新城，并营建了一大批景观地标建筑，如广州图书馆新馆、广东博物馆新馆、广州大剧院、国际金融中心IFC、花城广场、海心沙公园、广州塔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内部那些无处不在的村落，乍看上去像块块陈旧的补丁，夺目地夹杂在众多现代建筑、花园广场、城市地标的中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如果你由北而南过来，从北京出发，历游上海、杭州、厦门，一路往南抵达广州，你会顿生道路逼窄、空间密集的强烈反差感受。无论是飞机抵穗，还是火车达粤，进入市区的过程，就是一幢幢现代建筑、一条条城市公路夹杂着一片片由马赛克瓷砖拼贴修饰的村落景观不断映入眼帘的刺激体验。广州绝对不是你能预想的那种整齐利落的大都市，如果你仅仅有过经典现代性城市体验的话。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州的名声曾让人爱恨纠缠而复杂难言，它曾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前沿，但同时也曾是在全国出了名的脏乱差城市，加之本地自身发达的媒体系统还以各类社会案件的频繁报道为它增添了凶杀、仇杀、情杀等等光怪陆离的社会刻板印象。笔者曾经亲历的刻板传闻，也可供佐证。2008年底第一次赴羊城前夕，一位曾在珠三角地区有过生活经历的友人告知，如果从来没有到过广州，一定要多加小心。当她听说我将抵达广州站时，更是执意要请广州的朋友来接站，因为据说广州站附近陷阱丛生，随时可能有小偷、骗子、飞车党。由此，广州这座城留给大众的社会印象可

<sup>13</sup> 鲁晓鹏：《文化·镜像·诗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窺一斑。其实，自 2008 年以来，广州的公共治安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得力于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努力和第 16 届亚运会的申办，广州站所在的流花地区实行了无死角的全方位电子监控，并开通“越秀区政府流花地区旅客服务中心”，为抵穗旅客提供放心咨询服务。到 2010 年上半年，广州火车站广场实现了 116 天刑事案件零发。<sup>14</sup>尽管广州的实际治安有了好转，但城市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却并未彻底改观。今天的广州，尽管不再是个罪恶之城，但仍然是个让人难以由衷钦羡的“美好城市”。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对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城市风貌的一种经典评价：“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农村又像城市，城市又像农村。”或许，问题并不完全在广州本身，更重要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美好城市”？美好城市，是不是简单等于“田园城市”、“明日城市”？

按照香港学者马杰伟的说法，包含了广州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涵盖粤港澳三地）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的是一种“压缩式现代性”。<sup>15</sup>据称，这一理论表述源自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的“后都会”（post-metropolis）概念。所谓“后都会”，是指老工业城市中心的重构，它经由交通网络与邻近城市及卫星城镇连接而成为某种超级城阵。后都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大都会不同，大都会是绝对的城市中心主义，离市中心越远城市化程度就越低，而后都会则是散播的城市中心主义，它在城市化网络的不同节点上散布着多个中心。马杰伟指出，大都会对应于第一现代性，它立足于福特式生产、线性发展、工具理性，而后都会则对应于第二现代性，它立足于后福特式生产、非线性发展、跨国工作。在这一现代性问题视野下，马杰伟提出，大珠三角正处于转向后都会的进程中，其城市化进程所显示出的灵敏性和混杂性要比西方同类的形态更富活力和地方色彩。“压缩式现代性”，正是指大珠三角地区特殊的社会构成，即“结合了前现代农业精神、工业生产模式、大都会消费形式和后现代的混杂展示”。<sup>16</sup>无疑，这一切都与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巨大历史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所有根源便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启动和加速，在飞速展开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又来不及对农业文明形态进行现代式“祛魅”，大量村落及其文化形态得以夹杂在城市化区域遗存下来，结果便造就了大珠三角地区这种城不像城、乡不似乡的独特城市化景观。

<sup>14</sup> 林劲松、涂峰：《广州火车站十年治乱》，《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27日。

<sup>15</sup> 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sup>16</sup> 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压缩式现代性，对于我们理解大珠三角的区域城市化进程与现状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但是，一旦聚焦到广州这一具体城市内部的文化生态环境来看，可能问题会呈现出更有意思的方面，而侧重于时空维度解释的压缩式现代性还可获得更深一层的阐释空间。这需要我们进入到广州那更为细致的城市肌理和纹路之中，才能洞彻隐藏于“城中之村”与“村中之城”背后的完整生态结构。

著名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Kevin Lynch）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城市本身是复杂社会的强有力的象征。”<sup>17</sup>在林奇的眼里，一座城市是具有某种“可读性”的，可读性并不等于美观性，它是指能够使人容易地认知城市的各部分并方便地形成一个凝聚形态的特性。基于可读性，林奇提出了“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这一观念，它具有某种深刻的人文学内涵：“一处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这意味着，最甜美的感觉是家，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事实上，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sup>18</sup>显然，“城市意象”的评价标准并非是外表观赏性的“美”，而是内在关系性的“好”。

林奇对于城市的这种充满温情感、敬畏感乃至人性感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何谓“美好城市”有着非凡意义。因此，为了避免在字面上将“美好”片面等同于“美丽”，也为了避免在理论上将“城市意象”简单等同于“田园城市”、“明日城市”这类经典城市现代性的观念，更为了避免在经验上将“城市意象”简单等同于以经典城市现代性观念而营造出的高楼大厦、广场外滩、花园绿地，我们毋宁将之作些许调整，以“城市异象”来指称广州的独特城市景观及其所包蕴的某种独特方法论意味。任何一个初到广州的人，其实很容易迅速而清晰地将它与北京的广场意象、上海的外滩意象区分开来，其“异”所在正是它那“城”与“村”的杂糅景观。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主张，“最简单的、表面的东西也就是最高级的东西。”<sup>19</sup>城中村与村中城所表征的广州异象，也许不仅是这座城市的表面，同时更是其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的本质。

<sup>17</sup>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 页。

<sup>18</sup>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sup>19</sup>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 页。

## 五、生态城市现代性：“村际群落”的地方性知识

其实，全国各地都有类似“城中村”的说法，但是严格来看，却只有广州的“城中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学者高小康指出：“其他大多数城市的所谓‘城中村’其实是在城市规划尚未涉及的城市边缘地带，被称为‘城乡结合部’更妥帖。而广州的城中村却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它们大多数的确是插在已经建设起来的繁华市区中的一个村落孤岛。”<sup>20</sup>由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城中村”模式：第一种是普遍的城中村，普遍性并不等同于典型性，尽管它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地理位置上却多为城市化改造或建设规划未曾关照到的城市边缘地带，其实更妥帖的称谓似应是“城边村”；第二种是典型的城中村，典型性也不等于普遍性，它主要就是指广州城中村，地理位置上多为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众多村际群落。这里，与高小康的界定略微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广州的城中村并非“村落孤岛”而是“村际群落”，隐匿其后的是尚未获得深入认识的一种地方性经验及其知识。

认真比较一下普遍性城中村和典型性城中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差异：

首先，布局关系上，前者是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的一些散点，构不成线、面联系，更谈不上与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断裂和依附两种简单关系。后者的城与村关系既不是断裂绝缘，也并非简单依附，它们具有某种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曾举“鸭兔”图画的奇妙效果，<sup>21</sup>既可视为乡土村落嵌入了由商贸中心、现代公路所构成的城市领土，也可视为城市中心为乡土村落、传统河涌(河涌是指遍布珠三角地区的河水分支、汊流)所团团包围。

其次，历史经验上，前者是经典城市现代性进程尚未波及到的剩余区域，主要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它的前途终究将变为高档楼盘、花园广场和新一轮的城市地标建筑，而后者则是名副其实的“村”，有着自己独特的村落历史传承感，这种传承感不仅体现为实体建筑与场所，更体现为一种民风习俗的“村落精神”而存在，它复杂地包涵了经典城市现代性所无法理解的地方性经验。

最后，生态结构上，前者隶属于经典城市现代性的建设，远离唯一的城市中心，是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死角，要么凋敝落后，要么奄奄一息只待拆迁。后者则

<sup>20</sup> 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文化的包容性》，《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sup>21</sup>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0页。

处于大珠三角的这种压缩式现代性的区域结构之中，并不远离某一绝对城市中心，有的甚至直接处于新的城市心脏位置，尽管它们有着藏污纳垢的某些负面现状，但也有着走马观花者若不置身其中便难以觉察的生态活力。

这里，不妨以广州城区内最富于代表性的城中村猎德村为例来看看。猎德村，是广州市天河区属下的行政村，位于现在的广州城区新中心珠江新城的南部，村地域范围东接东圃镇石东村，西邻冼村，南濒珠江，北至黄埔大道。据《天河区志》记载，该村建于宋朝，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截止 2007 年，共有户籍人口 7000 多人，3300 多户，还有 1 万多外来暂住人口。传统的猎德村，珠江分支猎德涌从村中流过，将村庄分为东、西村，一河两岸景色秀美，村内保留着大量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石板街、古河涌，具有岭南水乡特色。沿河涌岸边分布有约十座岭南风格的清代祠堂、家庙和家塾，甚至村内每条老巷的名字，譬如崇惠里、德仁里、抗日里，都沾染着浓浓的历史传统情韵。<sup>22</sup>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岭南文化村落的典型代表，它一直保存了包括“扒龙舟”在内的诸多民风习俗活动。每到农历五月初一，总是要以村里的氏族为单位联络起来，然后去同全广州的其他村落进行“扒龙舟”的竞赛。据介绍，扒龙舟、舞醒狮、唱粤曲都是猎德村延续上百年传统的风俗，而猎德村最著名的“花龙”（即船身有彩绘的龙舟，其他地方的龙舟或是红龙，或是黑龙）和“游龙探亲”更是广州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sup>23</sup>这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好留存，正是以猎德村为代表的广州城中村的最重要特色。每到年节，各村之间都会组织适时的风俗活动，在珠江大小河涌里、在村落古老巷道里，或扒龙舟，或舞醒狮。可以说，正是“城中村”的存在为岭南文化的保留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并非我们今天在诸多旅游城市所能看到的那种仿民俗或伪民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岭南民间文化的活态保存。

当然，在历史文化遗产之外的另一面是，以猎德村为代表的广州城中村，确实也存在藏污纳垢的一面。由于广东地处开放前沿，流动人员数量巨大，而城中村的那些“握手楼”以其低廉房价又能满足众多底层人群的需求，于是飞车党、背包党、企街女等无不寄身于城中村。但这个问题需要更为辩证地看待，不能因

<sup>22</sup> 樊克宁、邓琼：《未来猎德村，岭南民居还是高楼大厦？》，《羊城晚报》2006年8月22日。

<sup>23</sup> 李立志：《猎德村：最后的扒龙舟》，《广州日报》2007年6月20日。

负面的存在而漠视了在更大范围内的城中村的文化生态意义。

实际上，城中村在城市中心的存在，为更多的正常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片可以寄居的屋檐。就广州而言，可以举出许多这种结构性生态共生的例子。比如，海珠区的康乐村毗邻广州国际轻纺城，天河区的石牌村毗邻天河电脑城，前者是国内最重要的纺织品集散批发中心，后者则是广州最大的数码产品市场。在这里工作的数量庞大的打工仔，其食宿问题都可在附近城中村获得相当低廉而合理的解决，同时也减少了中心与郊区的通勤人数。而在北京，就连租住并不便宜的地下室都有随时被清扫出门的不稳定性，广州城中村所表征的独特之处还不明显吗？一般常言，广州是个大市场，此言不虛。但严格来看，广州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商贸交易城市，如果缺少了这些嵌入城市中心地带的村际群落，恐怕会要大大增加其人力和交易成本。相较负面状况，城中村所起的这种经济生态效应一直被简单忽视了。同时，更重要的是，城中村的存在还隐现了一种包容底层民众甚至弱势群体价值的城市文化取向。原因在于，广州城中村不是离心化的，不是在经典城市现代性进程下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剩余物，它们一直位于广州城的各个贸易商圈周围和城市中心地带，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着隐性的补给和支持。

美国学者理查德·瑞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曾描绘过理想中的“生态城市”，它包含有“就近居住”、“紧凑规划”、“生态多样性”等原则，以高密度、功能互补的方式来规划城市。瑞吉斯特认为，“生态性”的核心意义就是“功能共生”。<sup>24</sup>鉴于此，笔者认为，广州的城与村，正体现为一种杂糅了经济文化诸多意味的“生态式现代性”，而并非简单时空意义的“压缩式现代性”。压缩式现代性，终究隶属于一种发展的、进步的时空观，它并未承载更为复杂的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生态式现代性，不仅区别于片面强调“旧貌换新颜”的“拆啦”式经典城市现代性，也没有止步于一种播撒形态的多中心城市规划想象，它的意义在于，跳脱受启蒙理性主义支配的客观物化态度，将城市视为城市境况，多元人群生存其中，它包容着他们的感情与记忆、困顿与期待。

生态城市现代性的现实载体正是“村际群落”。如前所述，“村际群落”（village community），不同于“村际孤岛”（village island），原因在于：首先，村落与村落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猎德村、康乐村、石牌村这些广州本土个案的地

<sup>24</sup> 【美】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王如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方性经验展示着，在文化民风习俗上，村与村之间依然保持着数百年来的交往与友谊，那些共同扒龙舟、竞相赛醒狮的决不是拿工资或劳务报酬的临时演员，而是本土本村的村民群众，到今天都不乏 80 后乃至 90 后的后生仔。其次，村落与城市之间也是相辅相生的。一方面，城市经济为村落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和外来人口，在耕地几乎被城市完全征用的现代性境况中，依靠商业租赁或住房租赁，村落的经济仍能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村落的存在也为城市提供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景线，本土本乡的古老村俗为现代城市商业中心增添了并非刻意而为的文化多样性。除此之外，村落还为现代城市起到了降低人力成本、减少通勤人流等作用，减少了诸多现代城市通病的出现。这些就是广州“村际群落”彰显的地方性知识。

## 六、认同重塑与美好城市：多元现代的“今日之城”

2007 年，猎德村，这座珠江边的典型性城中村还是遇到了城市改造这一必然的现代命运。但是，这是一场不同于国内普遍“拆啦”模式的“非典型”改造。其实，从 1996 年开始，猎德村的土地就陆续被征，用于建设广州新的城市中心珠江新城。自 2007 年 10 月始，猎德村更是开启了全面的旧村整体改造。对于国内普遍性的“城边村”而言，城市改造无非意味着谈个好价钱，然后搬迁和拆迁，或者做“钉子户”。无疑，大多数城改的关键问题就在于经济利益。但是，猎德村的改造却吸引了全广州的注意力，有补偿问题但不全在于补偿问题。社会目光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保存猎德村的古老岭南风情原貌，如何在改造的同时还能传承扒龙舟、舞醒狮、唱粤曲这些毫无经济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血脉。

猎德村的改造并非一味拆迁，注重保护村民利益，同时保护和延续历史文脉。2007 年，广州市政府对猎德村改造提出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是猎德的改造主体是村民，原则上市、区两级财政不投入，通过拍卖复建安置剩余用地筹资改造旧村，确保改造工作收支平衡、确保村民住宅复建和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二是拍卖剩余用地，扣除必要的运作成本和必须上缴国家、省的有关税费后，将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收益全额返还给村用于“城中村”改造。<sup>25</sup>改造方案将原猎德村内具有历史与人文价值的宗祠，规划于新建的猎德大桥东侧，邻涌边及池塘边集中复建，

<sup>25</sup> 谭希莹、孔小云：《猎德村“头啖汤”成功饮》，《南方都市报》2010 年 10 月 27 日。

结合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功能延续猎德的建筑文化和宗祠文化。对其它不作集中迁建的古建筑，也结合区内园林绿化进行统一设计，同时按民俗传统在北边设置池塘，以保证延续猎德传统龙舟文化。<sup>26</sup> 2010年，猎德村改造完成。可以说，这次改造较为完善地保存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同时，原村民在改造完成后原址回迁入住复建现代楼房。尽管村民的居住条件有了变化，但四周保留或复建的猎德宗祠区、猎德牌坊、龙母庙、岭南水乡民居依然向经过的人们展示着一个村庄的久远历史。至今，猎德村民们仍然居住在这块乡土上，每逢端午、新春依然扒起龙舟、舞起醒狮。甚至入住复建安置区，村集体还主持摆起了 808 桌的露天宴席，款待入伙新居的村民们。<sup>27</sup> “吃饭”所表征的是一个最重要问题：古老村落群体认同的保留与延续。

这种村落性、宗族性的群体认同感，正是广州本土的地方性经验所不同于北京、上海的独特之处。广东地处岭南，其本土族群基本可分为广府群体、潮汕群体和客家群体三大文化族群。它们都具有强烈的宗族认同意识。这种渊源有自的传统认同，至今仍然保留在岭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即便在城市，也遗留在了城中村的文化血脉内。如果按照普遍的现代性观点来看，这似乎有点“旧风俗”的嫌疑。用马克思·韦伯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一个尚未完全祛魅的世界。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传统身份认同的存在未免没有给我们提供别样理解城市现代性问题的契机。

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指出，西方“原生的”现代性文化方案造成了三种重大变化：强调人的能动性以及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观念，赋予人对于自主创造未来一种新的想象；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使之丧失了以往的合法性；给予人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去质疑一切未曾祛魅的事物或现象。<sup>28</sup>同时，这种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还具有同质化和霸权化的性质，妄图随现代性在全球扩张而得到普遍应验。但事实却是，现代性的确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却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制度模式。社会和

<sup>26</sup> 广州规划在线：

<http://www.upo.gov.cn/pages/zt/ghl/gh10years/lswhmc/case/2010/5216.shtml>

<sup>27</sup> 刘显仁、黎亮：《广州获整体改造城中村摆 808 围酒席招待村民》，《广州日报》2010 年 11 月 22 日。

<sup>28</sup> 【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39 页。



社会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有同也有异，此即为“多元现代性”。<sup>29</sup>

其实，经典城市现代性正是这一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的附属品。它主张城市的功能分化，区隔作为工作场所的城市中心与休息场所的花园新城，甚至极端厌恶老城市，主张推倒重来。只要返顾广州的地方性经验，我们就会发现经典城市现代性正是近代以降西方普遍主义和文化霸权的产物。它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考虑到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本身更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的生成体，只有依托具体而多元的文化土壤才能更好生活。因此，一座城市的“美好”，并非“田园城市”、“明日城市”的乌托邦蓝图，而更应该是充分具有历史包容性、文化包容性、阶层包容性的系统生态筹划。再深入一层来看，美好城市的根本要义，并不在于整齐利落、现代豪华，它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人们对于城市本身的认同感，感觉到自己命运与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央商务区的周围，居然能保留下整整一个村落及其生活方式，这是比仅仅维护古建筑更有意义的启示。

按照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看法，“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sup>30</sup>它的三大动力是“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反思性”，它们共同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将人从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然后再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进行“再联结”。就马克思意义上的“人是社会关系总和”来看，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传统社会关系的打破和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但是，新型社会关系一直存在深刻的危机。在传统社会中，人的身份意识体现为对祖先、宗族等共同体的传统归属感。进入现代社会，一切的传统归属感被无情地祛魅，被专业分工乃至跨地区、跨国界的工作流动消磨殆尽。在这种过程中，人开始产生了“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以自我的反思性来为自我赋义。就此而言，现代性规划可以理解为自我认同取代了传统认同，自我认同塑造出了一个貌似自主有力的现代主体。但远离传统归属的另一面，却是现代人普遍的“焦虑”心理，以及时而涌出的“个人无意义感”。<sup>31</sup>焦虑的根本在于，仅仅拥有自我其实根本无法支撑起全部的人生意义，否则“死亡就意味着失去唯一属于你的东

<sup>29</sup> 【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5 页。

<sup>30</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2 页。

<sup>31</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36 页。

西”。<sup>32</sup>失去了传统归属，个人的生存便为孤独焦虑和永恒死亡所威胁。

本文伊始所提及的“逃离北上广”与“逃回北上广”这一社会热议话题，其实正是这一现代性症候的中国版呈现。归去来兮的群体，绝大部分都并非“北上广”的土著居民，更多的是打工一族、奋斗一族。这些群体怀揣着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美好梦想，从乡土社会抽离出来进入大城市，基于现实压力与认同迷惘，徘徊不已，盘旋来去。这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和不舍，又无不和承载它们的容器——城市——这个母体密切相关。虽然，以猎德村为代表的广州本土城改案例，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后传统社会中乡土村落与现代城市的生态共建问题，但是，如何解决更为广大的非本土流动人群与一个古老城市之间的新的归属感、认同感的达成，是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城市现代性改造所面临的更迫切问题。

作为方法的广州，留给了我们一种现实主义而非现代主义的观念启示：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座“今日之城”，而非“明日田园”。

---

<sup>32</sup>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页。